

Reinterpreting

Inner

Asian

重释内亚史

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History

钟焄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Reinterpreting Inner

Asian History

重释内亚史

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钟焄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 钟焯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

ISBN 978 - 7 - 5201 - 1516 - 2

I. ①重… II. ①钟… III. ①亚洲 - 历史 - 研究

IV. ①K30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508 号

重释内亚史

——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著 者 / 钟 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郑庆寰

责任编辑 / 王 展 郑庆寰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33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516 - 2

定 价 / 6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伯希和及其内亚史研究概观	59
第二章 丹尼斯·塞诺眼中的内亚史	113
第三章 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	179
第四章 乌瑞夫人北亚民族学研究的贡献与启示	251
第五章 王明珂与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	303
第六章 从森部豊看日本粟特研究的新动向	347
溯往与展望	382

导 言*

本书所涉及的“内亚”(“内陆亚洲”的简称)诚属一个界定起来颇费思量的概念。首先,它无疑属于翻译成中文的外来词。以笔者个人粗浅的观察,“内亚”一词起初应该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 Inner Asia,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总之,它出现及流行的时间并不太长。^①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亚”(Central Asia)相比,“内亚”似乎更多的是在学术场合使用,而“中亚”一词则不仅在学界流通,甚至也被大众传媒广泛运用。

在作为学术用语的“内亚”一词流行之前,法国学界长期以来惯于使用“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一词,这大概是根植于18~19世纪的欧洲地理学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地理学家看来,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都被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脉和高原占据。像伯希和撰写的一本介绍内亚历史文化的概论性著作就叫作《高地亚洲》。^②至于俄国、德国学术界,过去则倾向于使用“中部亚洲”和“中央

* “导言”的部分内容改写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中的《钟焄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并增补了相应的文献注释,删去了其中关于辽史的部分。该次访谈的主题系由郑诗亮先生费心设计,他以后又拙文多有润色,笔者在此对郑先生的辛勤工作深表致谢。

① “内亚”(Inner Asia)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由俄国学者莫希凯托夫(I. Mushketov)正式提出,而“中亚”(Asie centrale)早在1843年就出现在洪堡(A von Humboldt)的著作中。参见L. I. 米罗什尼科夫《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载A. H. 丹尼等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第366~367页。

② P. Pelliot, *La Haute Asie*, Paris: L'édition artistique J. Goudard, 1931.

亚洲”这两个含义接近但又彼此区别的专业术语——前者对应俄语的 Средняя Азия、德语的 Mittelasien；后者对应俄语的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德语的 Zentralasien。第一个概念主要是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及其邻近地区，第二个概念起初包括的地区非常广阔，大致从里海东岸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一带，不过后来在实际运用中逐渐缩小到专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① 2008年，一位德国学者出版的论内亚古突厥人历史的专著即叫作《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的古突厥人时代》。如此命名，是因为该书的主题主要涉及古突厥人在蒙古高原和中亚河中地区（Mawarannahr）两大区域的历史活动，同时这位学者认为所谓的“内亚”包括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往往还涵盖了黑海北岸、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中国的西藏和东北、外贝加尔地区，而上述地区一般来说并非该书在考察古突厥人历史时所重点关注的区域。^②

可见“内亚”这个概念，虽然在应用中有其方便之处，但的确包含太广，很容易遭到质疑，因为所谓的“内亚”竟可以被用来指代西起南俄草原，东抵黑龙江下游甚至库页岛一带的极其广袤的地区，有时其北限接近北极地区，南界则止于青藏高原。显然，其中有不少地区间的生态差异很大，如直接濒临漫长海岸线的中国东北和俄属远东，就与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腹地明显不同。将它们共用一个术语来概括，至少从生态环境上来说有些牵强。由此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当初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是如何处理其定义严密性的？

关于这一点，塞诺先后发表过《论中央欧亚》和《何为内亚？》两文来详细介绍其对“内亚”的看法。^③ 在他的概念界定中，内亚

① 潘志平、石岚：《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S. Stark, *Die Alttürkenzeit in Mittel-und Zentralasien: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8, SS. 6-8.

③ D. Sinor, "Central Eurasia", in D. Sinor ed.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54, pp. 82-103; "What is Inner Asia?" in W. Heissig ed. *Altaica Collect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pp. 245-266.

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实际上可以相互置换。而他对内亚概念的类似梳理也见于由他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导论。塞诺坦承，内亚这一术语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在他看来，内亚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简言之，在塞诺构建的欧亚大陆历史观中，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蛮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而在承受蛮族影响这一点上，欧洲与中国在历史上均未幸免。因此，他在《剑桥早期内亚史》中不仅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设立专章，而且把在欧洲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也一同囊括进来，以此呈现内亚民族作用于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全貌。^① 如此看来，“内亚”在塞诺的定义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广袤性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塞诺之前，拉铁摩尔已经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随后在欧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② 这大概是第一部将“内亚”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并大获成功的西文学术经典。当然，拉铁摩尔关注的“内亚”只限于处在当时中国国境以内西—北边疆的几大地理板块，远远没有像后来塞诺定义得那样宽广。不过正因如此，它才适宜被定性为一部中国史著作，而非像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以“内亚”命名的专著那样，实际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不过，在拉铁摩尔所处理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大板块中，只有蒙古草原才被他视作最典型的边疆历史，而其余三大板块所对应的各自社会均被当作蒙古草原历史的各种变形。

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

①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② O.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1940. 国内最近有唐晓峰先生的新译本，书名叫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临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及考古学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

不过作为学术概念的“内亚”一词被国内史学界所接受，在时间上则要明显晚于日本。早在1940年代初，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内陆アジア）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①随后冠以内陆亚洲之名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此外，自1950年日本全国性的内亚史学会成立后，将中国北方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二战”结束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满蒙史”一名的新认知范式，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部分重合的“中央欧亚”（中央ユーラシア）、“北部欧亚”（ユーラシア北方）、“东部欧亚”（东ユーラシア）、“西北欧亚”（北西ユーラシア）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②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引入了民族史的研究理念，因此地域色彩突出的内亚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重

① 『内陆アジアの研究ヘーディン博士記念号』ユーラシア学会、1955。

② 其中“中央欧亚”的概念最常用，“北部欧亚”则被江上波夫、角田文卫等考古学者所使用，最近流行的则是“东部欧亚”和“西北欧亚”，对前者的介绍详见后文，而“西北欧亚”则主要指包括南俄草原在内的俄属欧洲部分。

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有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运作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项目的启动，与之关联的“内亚”概念才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以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先生及其弟子对它的接受最为明显。在韩先生于 1983 年去世以后，国内外的学界同仁有了编辑一部文集以志纪念的动议，这部文集也就是最终在 1996 年问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① 它应该是国内第一部以内亚作为书名的专业类史学著作。同时以内亚史作为主要研究分野的学术路线在韩先生培养的弟子那里得到了清晰的延续。以后随着中外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和获取外文资讯的途径日渐通畅，这种以内亚为重心的地域史研究范式在最近十多年得到更多学人的积极认同，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所承办和编辑的多种学术出版物。^② 可以说，在当今国内学界，该研究室和南大历史学院同为内亚史研究的两大传统重镇。

说到“内亚”，不免牵涉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内亚性”“内亚视角”“内亚因素”等，这些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加以应用。因此有必要首先认真梳理这些学术概念，从而准确识别出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成果。坦率地说，笔者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失于片面。这主要是因为笔者对内亚的知识了解基本都是来自课堂和图书馆，缺乏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考察的经历，而要很好地梳理回答上述问题，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个人肤浅的体会，由内亚这个术语衍生出的诸如内亚性之类的概念渐渐出现在学术研究中，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学界共识：内亚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并非像我们以前熟知的民族史那样，完全附属于中国史之下；此外，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将两

①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② 该研究室主编的此类代表性连续出版物相继有《中亚学刊》《欧亚学刊》《丝瓷之路》《欧亚译丛》等。

者割裂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①从最近“内亚性”在年轻学人中引起的共鸣来看，它在未来有希望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主流认知。这也意味着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比之下，此前我们强调较多的民族史主要关注的还是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问题，往往缺乏从更为宏观深入的层面把握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走向。

此外，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各位学者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以下拟举具体的研究实例对其略作说明。

罗新教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重点探讨了属于“代都旧制”下的北朝皇帝和后来蒙元君主的即位仪式，似乎适宜被归入第一层次，彰显了内亚独有的政治传统在传统华夏帝制文明的大背景下的延续轨迹。^②而最近川本芳昭在其新著中将北朝的鲜卑人内朝亲信侍从集团、辽金统治集团的著帐官制度、元朝的那可儿—怯薛政治群体等进行类比研究后，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也属于这一层次。^③同属于此的，还有杉山清彦在《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第五章“作为中央欧亚国家的大清帝国”中，对八旗制、分封制与侧近侍卫制与蒙元帝国做的比较研究；^④志茂硕敏在《蒙古帝国史研究正篇》第三部《中央欧亚游牧国家史研究上的终极课题》中的

① 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载氏著《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第88～91页。

②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第1～74页。

③ 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汲古书院、2015、451～487頁。
以类似的角度研究北朝史的成果还有会田大辅「北周侍卫考——游牧官制との关系をめぐる一」「东洋史研究」第74卷2号、2015等。

④ 杉山清彦「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251～301頁。

相关展望等。^①由此可见，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延续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方面他们也取得了若干有启发性的成果。显然，这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引入了内亚史的研究范式，这一学术流派在东洋史学科下业已发展得相对成熟。毋庸讳言，日本学者在将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其取得的成果，我们宜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至于第二层次，也就是内亚元素在观念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塑改造，突出体现在如下方面：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在整个官僚统治体制中弥漫和渗透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关系也是长久以来维系中原与内亚之间政治秩序的一种基本手段。我们从《册府元龟》所载的粟特城邦君主致唐玄宗的国书和晚期满文档案中所见的清朝－哈萨克之间的主子－属民关系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②不过，我们对政治层面上的“内亚性”的界

① 志茂硕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正篇 中央エーラシア游牧诸政权の国家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1011－1023頁。

② 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原文发表于1942年），载《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第114～115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53～57页。Onuma Takahir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azakh Nomads in the Mid-18th Century: Promotion of the ejen-albatu Relationship in Central Asia”, in. Noda Jin and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Univ. of Tokyo, 2010, pp. 86－125.

定也应该趋于严密，不能罔顾基本事实而动辄滥用。举例来说，1634年皇太极从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处获得了所谓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即将国号改金为“大清”，国外有个别学者将之解读为清朝继承蒙古的政治遗产，将清朝定位成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从而把清朝从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中剔除。^①然而，传国玉玺恰恰不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素有的象征正统的基本权力符号，林丹汗和皇太极看重所谓传国玉玺所承载的正统性，反而凸显中原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传统的改造。

中国历史中的第三层次“内亚性”，表现为汉族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的内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历史研究者用笼统的“胡化”一词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其实都与“内亚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薛爱华（E. Schafer）、贾敬颜、吕一飞、陈三平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较为集中的答案。^②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某些汉语词语，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很可能来自内亚地区的古代语言，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杨虎嫩（J. Juha）对“马”的词源学考察，以及陈三平和司律思（H. Serruys）对“哥哥”和“荷包”两词所做的个案研究。^③不过，按照多年以前葛晓音的一个概括性论

① H. Okada (冈田英弘), "The Yüan Seal in the Manchu Hands: The Source of the Ch'ing Legitimacy", in G. Bethlenfalvy etc eds. *Altaic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Meeting of the PIAC, Budapest June 24 - 29, 1990*, Budapest, 1992, pp. 267 - 270.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Sanping Chen,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③ J. Juha,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 Victor E.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1, Washington, D. C., 1998, pp. 415 - 430; Sanping Chen, "Agan Revisited - The Tuoba'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eritag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30/1, 1996; H. Serruys, "Ho-po, ho-pao 'pouch' = Turkic qap, xap", *Oriens Extremus* 15/1968.

断，这第三层次表征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如衣食住行等所经历的“胡化”都属于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还不足以显示汲取它们的汉族群体已经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①

至于与“内亚性”存在关联的“内亚视角”，不妨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站在内亚民族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的独到观察和解读。对此不妨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靖难之役”为例稍做说明。众所周知，本来这次夺权之争所涉及的两位人物明成祖朱棣和惠宗朱允炆是辈分存在明显差异的叔侄关系。仅仅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年，前往中亚帖木儿汗国的西班牙使者就在撒马尔罕附近获悉了发生于明朝内部的这场政变。不过使臣从当地打探到的消息却是明朝皇帝去世后，遗嘱规定帝国疆土由三位皇子分别统治。结果大太子试图兼并两位兄弟的封地，以致引起了内战。最终大太子因战事失利而自焚身亡，新的天子随后即位，并遣使出访帖木儿汗国催索贡品。^② 因此，叔侄之争的信息传到了中亚一带以后，被改换成了兄弟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③

两者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因为我们在内陆亚洲地区流行的众多始祖起源传说中都能找到这种“兄弟之争”的母题模式。譬如《宋书》记载的慕容鲜卑部首领去世以后，长兄吐谷浑因为与弟弟在放牧中发生纠纷，于是带领部下离开故土远迁青海。11世纪的波斯文史书《记述的装饰》也记载了两个相同类型的故事。一是说中亚草

① 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 [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杨兆钧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58～159页。

③ 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46～47页。

原的基马克汗国的始祖本是鞑靼部落首领的幼子，父亲去世以后，和继承首领职务的兄长不和，最后设法离开故土，前往额尔齐斯河一带定居。二是说西州回鹘原来的可汗被其兄弟阙特勤用武力推翻，于是后者成为回鹘人的新任可汗。^①

以上这类故事很可能并非史实，但其背后反映出内亚民族习惯用一种兄弟相争的叙事模式来解释统治权力在男性亲属之间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家族的分裂－再生现象。如果深入挖掘产生这一叙事模式的社会机制的话，这显然与傅礼初总结的内亚民族中常见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bloody tanistry）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克拉德（L. Krader）在《突厥－蒙古游牧人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揭示了草原游牧社会进行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模式：部落首领晚年在分配政治遗产时，经常倾向于将政治头衔传授给社会经验和阅历人脉都相对丰富的长子，又将部民财产更多地赐予通常肩负“看家守灶”之责的幼子。^②这样一来，更为容易发生权力竞争的兄弟双方同时打下了实力基础。因此，帖木儿汗国的民众和草原上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把本为叔侄之争的“靖难之役”重新解读为符合他们自身观念的“兄弟之争”。这一不合史实的刻意修改恰恰正是以“内亚视角”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需要对读者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的主题涉及对国外内亚史研究成果的评析，但严格地说，笔者并非从专业角度评价西方内亚史研究水准的妥当人选。这是由个人自身学术训练中的弱项所决定的。首先，笔者并无任何海外留学或访学的经历，因此对国外学术动态的了解只能依靠阅读相关图书馆收藏的极其有限的外文资料来补救，不难想象在见闻上受到的局限之大。其次，在工具性外语和专业型研究语言的训练上严重不足，这一点直接影响了

① 参见王小甫译《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② L.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63, pp. 349 - 351.

笔者自身考据水平的切实提高。最后，如前所述，笔者欠缺进行实地学术考察以搜集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经历。因此，笔者个人此前所做的思考总结仅仅是一种极不成熟的尝试之作，充其量也就是可备一说而已。而以下展开的一些分析概括同样只能当作挂一漏万的抛砖引玉之论。

20 世纪上半期可说是用考据方法研治内亚史的黄金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三位学科巨匠是俄国的巴托尔德（V. V. Barthold）、德国的马夸特（J. Marquart）以及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三人当中，只有伯希和的考据成果才显示了明晰的汉学研究模式，而巴托尔德和马夸特所秉持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东方学家的治学路数。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也是伯希和，对此笔者将在本书的第一章对其学术成就做专门的评价。^① 至于巴托尔德，目前他也已有若干专著被译成了中文，国内的专业读者对其治史的风格想必也不陌生。^② 故对这两位大家，导言中就不再赘述。

只有马夸特的研究成果，几乎完全没有被译成中文，甚至连向来非常注意搜集学术情报的日本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也不高。^③ 日本一位颇有影响的中亚史学者在列举西方的老一辈研究内亚史的代表性学者时，就漏掉了马夸特而代之以劳费尔（B. Laufer），其实后者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者。故马夸特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之大与其在中、日等国的影响之小形成了莫大的反差，而按照塞诺的观察，马夸特独具的宽广知识面竟然让被推崇为拥有“无限知识”的伯希和都为之望而生畏，由此可见马夸特学术成就的粲然可观。依笔者极不全面的个人观察，综观整个 20 世纪

① 相关的内容初刊于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 7/2, 2015.

② 巴托尔德的中文译著除了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和 200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以外，还有兰州大学出版社近年刊出的译自作者全集的《中亚历史》两卷本。

③ 马夸特的著述目录参见 *Journal Asiatique* 1930, pp. 313 - 324.

后半期的相关学界，大概只有前些年去世的匈牙利东方学家哈尔玛塔（J. Harmatta）在治学的广博程度上有接近马夸特的趋势，可惜他的不少重要论著只用匈牙利文发表，以致极不便于国外学者参考。^① 故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匈牙利语，并将匈牙利东方学界取得的大批学术成果系统、全面地介绍给国内知识界。

而在“后伯希和时代”之后的国际东方学界，似乎陷入一种因大师不在而回归平常的局面。当然，我国史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可见因学术发展趋于专业化而难以产生大师的总态势，在东西方都存在。故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大可不必以缘何当下的教育体制培育不出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而自寻烦恼。仅以笔者个人平时的阅读体会来说，对以下三位外籍学者的内亚史研究成果最为钦佩。

第一位是日本的榎一雄（1913～1989），他或许是最有资格被誉为“东方伯希和”的东亚历史学家。^② 除了治学领域皆以广博见称以外，榎氏与伯希和还有几点酷似。其一，他掌握的语言工具非常之多，绝不限于通常所知的那几种欧洲语言，据称在那一代治中国古代史的日本学者中，他是唯一能够阅读意大利语专业文献的人。因此其中亚史论文中基本上能够做到对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竭泽而渔，这对东亚学者来说，实在是极难做到的。举例来说，他考察亚美尼亚史料中所见的厥哒与贵霜的论文，在引用资料的完备程度上甚至足以压倒欧美学者的同类论著。其二，他的考据悟性极其敏锐，几可追步伯希和，其去世后由汲古书院刊行的多卷本论文集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二章最后的补记。哈尔玛塔 1977 年前的著述目录参见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5, 1977, pp. 13-24. 该刊物的上述第 25 卷实际是哈尔玛塔的贺寿专辑。据笔者所知，他只出过一本西文个人论文集，即 *János Harmatta Selected Writings: West and East in the Unity of the Ancient World*, eds by L. Harvas etc, Debrecen, 2002. 是书收入了 34 篇作者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的论文，并划分为五个不同的主题。

② 海外华裔汉学界曾将杨联陞推重为“东方伯希和”（周一良：《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第 43 页），但验诸实际贡献和研究领域，十七岁就写下长篇论文《赵翼的史学》的榎氏与伯希和的治学共同点显然更多。

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考据成果为支撑的实证型论文。^①其三，榎一雄同样精熟于汉语文献，目录学功力尤其深厚。其四，他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颇见深度的专业书评，这些书评与论文一样，共同反映出榎氏对内亚史的精深造诣。

第二位则是1999年去世的法国学者石泰安（Rolf A. Stein），他可以说是自伯希和之后法国唯一在汉学、藏学、阿尔泰学和印度支那研究中都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来说，国内知识界常常将他仅看作藏学家，这其实很不全面。石泰安论东亚宗教思维中的“小宇宙”模式的专著《微缩世界》曾被薛爱华夫人译作英文，^②薛爱华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导言，高度评价了石氏的学术成就，将他定位成自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大师陆续凋零后，能够真正继承法国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最佳人选。这种评价可能跟我们通常所知的法国汉学传承学术谱系大不相同，因为戴密微、韩百诗乃至年龄更小的谢和耐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都要明显高于石泰安。然而，薛爱华的评语并非恭维溢美之词。就已有中文译本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观音：从男神变女神的一例》等著述来看，石泰安的研究深度在他那一代法国汉学家当中确实无人可及。^③尤其是将他的上述著作和同样也有中文译本的谢和耐个人论文集对读，更能直接印证当年闻宥做出的后者功力远逊于石泰安的评价。^④

以《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为例，其中的不少注释都可以扩充成一篇论文。而该书的第六章“从冲木格萨尔到岭格萨尔”

① 从1992年开始，汲古书院陆续出齐了多达12卷的《榎一雄著作集》。其西文论文集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也于1998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② Rolf A. Stein, *The World in Miniature: Container Gardens and Dwellings in Far Eastern Religious Thought*, Stanford Univ. Press, 1990.

③ [法] 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同氏译《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载《法国汉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86~192页。

④ [法] 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闻有的评价参见张永言整理《闻宥遗札》（上），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80~81页。